

本报记者邓华宁

## 常州：防疫复工，网格化治理优势凸显

江苏常州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在防疫复工中发挥重要作用。常州溧阳市发动上千名机关党员与网格员担任小区楼长，加强疫情防控监督等工作；经开区2000多名网格员化身防疫卫士，对全区300多个网格进行拉网式排查，帮助居民生活服务；天宁区网格员、社工等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将一个社区和街道打造成为“严密、安全的‘抗疫堡垒’，为防疫构筑起‘铜墙铁壁’”。

## “若有召唤，愿为先锋”

自2月下旬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常州各乡镇街道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将防控工作下沉到每个社区、每条街道，为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维护群众健康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常州市政法委统计，防疫复工中，常州市1000多个城乡社区成为最前线，基层干部、社区网格员毫不犹豫扛起繁重的防控任务和巨大压力，承担起宣传、防治、排查、统计、汇报等工作，成为疫情防控中的中坚力量。

“春节以来没有休息过一天，前期冲到交通卡口排查、上门宣传服务，后期帮助企业复工，有一次一晚上去机场接了好几拨人，通宵没睡觉。”天宁区牟家村网格员朱毅介绍，牟家村有5个小区，外来人口多、企业多、风险点多，但在下沉干部和网格员们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拉网式”信息排查，不放过任何死角。“网格员工作在防疫一线，风险仅次于湖北支援的医务人员，春节后的一段时间，许多网格员不敢回家，几个星期都睡在办公室里。”

“网格是基层最小的治理单元，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力量导入网格、资源沉入网格，确保了‘两手硬、两战赢’。”天宁区委副书记舒文介绍，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全区只用了3小时就下派数百名机关干部，24小时在网格一线抗疫，应该说平时打下的基础为战时的及时响应赢得了时间。

常州新北区政法委书记黄克非介绍，新北区有1134个网格，每个网格有1名专职网格员，疫情前近一个月内，网格员加班至凌晨是常态，通过信息核对逐一排查了3300多名重点人员。

“若有召唤，愿为先锋。”回忆起防疫工作，常州市经开区遥观镇副镇长张波说，从大年三十接到上级防疫部署后，全镇网格员积极行动起来，上门登记排查、科普宣讲；帮助隔离人员购买米面粮油、药品，每天为他们测量体温、登记报表。遥观镇有1700多家企业，后期复工中，所有企业都有网格员上门，对接企业需求，落实线上线下招聘，组织外地工人返程等，一个不少全部服务一遍。

## 网格化治理显现出四个优势

记者采访获悉，自2016年以来，常州市在社会治理中以“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建设为载体，党员干部挂钩网格，市民热线对接网格，多部门力量导入网格，推进“一网通办”。疫情阻击战中，这张大网接受了新冠疫情实战检验，表现出以下优势：

一是全打通，各领域党员干部迅速下沉服务社区。常州市政法委书记马剑介绍，全市目前有社区1031个，网格员13000多人。经过几年建设，目前常州市每个社区基础网格至少配备5名“网格员”和数名志愿者，社区网格之上，有街道网格管理中心，区级各部门都有相关人员与街道网格捆绑，形成部门、街道和社区网格员三级会办制度，并吸引社区党员参与，促进共建共享。

疫情发生后，全市投入网格一线防控的机关党员干部6484名，全市65家市级机关党员干部奔赴基层一线，实现市、区、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打通，各级下沉党员基层全参与。

二是全覆盖，网格化管理服务不漏一户一人一企。“网格化防控的最大优势就是全覆盖，不留盲区。政府管理、社会自我调节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在网格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常州市经开区横山桥镇党委副书记章春军介绍，从大年初五开始，镇村两级干部，村民小组长纷纷加入网格，每人结对10至20个人，在卡口管理、邻里守望、社区巡防上做到规范有序，信息不漏。大到社区集镇，小到每个楼道、村庄都进行网格责任包干，做到责任可追溯。在复工中，网格员组成4支小分队线下复核，网格员成了驻厂员，现场复核，每个企业不超过1小时。

三是全动员，整合基层力量形成合力。疫情暴发后，常州各区迅速动员街居、乡村干部、党员、民警、医务人员、物业企业和居民群众等基层力量，建立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专兼职网格员队伍。溧阳市一群24小时值守的“守门人”成为网格化管理的主力军，包括基层干部、党员、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等等。溧阳市公安局昆仑派出所辖区内有企业800多家，外地员工1.6万人。复工过程中，通过网格+警员的服务方式，督导企业完成复工方案、应急处置预案，帮助企业成立疫情防控机构，设立专人专岗，全面落实防疫措施，推动辖区内企业全面复工。

四是全手段，人防物防技防立体化防疫。常州各区网格化中心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推出了一系列有效举措。比如，在防疫宣传上，不少社区利用无人机喊话，使用无人机搭载网络摄像头，对社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社区居委会通过社交通信工具(如微信、钉钉等)深度参与业主生活，积极收集业主意见并统一反馈，及时解决各类问题。常州新北区还启用5G热成像体温筛查设备，通行效率大大提高。

## 深挖数据资源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在网格化服务治理中，注重引进新技术开发应用大数据资源提升效率，创新模式建设了全市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记者现场看到，这个中心开发出了与国土GIS地图无缝对接的云图，完成网格员定位、轨迹查询、智能推送、智能预警等功能。该中心还直接连接着全市3900多名各级党员干部，每个人都分配有网格。此外，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城建、司法部门执法力量等连接网络。记者点开一个网格，网格编号及类型、服务对象、网格联络员、网格员、网络志愿者等信息一目了然。

常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双庆说，网格化服务中心2018年8月运行以来，平均每天接到1.3万件事项，全市初步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这次网格化精准防疫实践，防疫力量下沉到基层源头，各种信息汇聚到网格化中心，为迅速掌握情况决策执行赢得了时间。

常州市戚墅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文菊说，现在每个街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格化中心，集中各类防疫复工信息，并且与区、市的网格中心互联。实践证明，基层是感知事件的第一线，也是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将治理力量和科技手段向基层下沉，源头上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方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网格化防控，既解决了‘看得见管不了’的问题，也解决了‘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慧卿教授认为，网格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背后的实质是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条块重构。

“常州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先进管理制度，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提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一流治理提升一流品质。”常州市委副书记黎骏说。

## 铜陵：“城市超脑”让城市更聪明

新华社合肥5月12日电(记者张紫斐、董雪)“都市嘉园三号楼发生高空抛物。”当有居民乱扔垃圾、高空抛物时，安徽省铜陵市的“城市超脑”能立即自动捕捉信息，并通知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处理。

“乱扔垃圾、高空抛物常引起居民矛盾，‘城市超脑’依托楼宇外立面监控为社区安上智能‘眼睛’，不仅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还能锁定抛物住户。”铜陵市幸福社区工作人员朱军说，这样的智能治理场景在铜陵很普遍。

5月11日，作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市之一，铜陵正式上线支撑经济、社会和城市管理全局性智慧化升级的开放式运营平台——“城市超脑”。这个平台2018年启动建设，并

于2019年11月试运行。

据介绍，铜陵上线的“城市超脑”涵盖城市管理、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7大类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视频自动感知技术，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比如城市管理涉及的事件种类繁多，包括商户店外经营、建筑垃圾倾倒、违规户外广告等，过去只依靠铜官区约300名工作人员人工巡查，很难及时处置。现在‘城市超脑’发挥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可以很快发现并解决问题。”铜陵市铜官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数字化中心负责人周伟切身感受到，“城市超脑”的运行使得城市治理效率大幅

提升。数据显示，原先依赖人工巡查时，铜陵市每起城市管理事件的平均处理时间为3天至4天，现在仅需1天就能完成。

得益于“城市超脑”，铜陵市还将原先较为单一的政务类数据进一步扩充为包括城市管理、民生服务、交通运输、金融信贷等在内的城市全貌数据，累计接入57家单位的30.44亿条数据，共享开放27个数据服务接口，累计发现事件超过5000起。

“城市超脑”也让社会治理变得更有温度。铜陵市幸福社区2.1万人口中约三成是老人，其中不少是独居、孤寡老人。“有时候一天没出门，社工就会上门来

看看。”长年独居的74岁老人章萍说。得益于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老人进出家门的信息被准确捕捉，一旦出现异常，“城市超脑”便会自动提醒社区人员关注。

据介绍，铜陵“城市超脑”的本领还在增加中，交通大脑、智慧教育等细分模块都在有序推进，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同时，“城市超脑”的触角有望延伸到每位市民，市民发现城市治理问题后可以拍照上传，进一步扩大“城市超脑”的感知范围。

“未来，‘城市超脑’或许有机会真正进化为城市的‘大脑’，让百姓享受到更多‘数字便利’。”铜陵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方永杰说。

## 永定河北京河段实现全线通水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关桂峰)历经22天的“旅程”，在北京境内穿行170多公里，12日15时18分，官厅水库向永定河下游生态补水的水头“冲”出了北京，永定河北京河段实现全线通水。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4月20日8时，官厅水库开闸放水，永定河生态补水启动。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北京、河

北、天津，入渤海，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永定河流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

目前，官厅水库水位已由476.58米降至475.19米，累计出库水量1.47亿立方米。三家店拦河闸累计下泄水量1.1亿立方米；卢沟桥拦河闸累计下泄水量0.93亿立方米。三家店以下形成水面面积2100

公顷，与补水前相比，永定河门头沟陈家庄至大兴西麻各庄沿线地下水埋深平均回升2.07米，最大回升点是门头沟陈家庄20.02米。

据了解，这是自2019年以来第二年通过引黄河水修复永定河流域生态。北京市水务局提醒市民，虽然水头已过市界，但水势有起有伏，请市民不要冒险进入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避免扎堆聚集。

## 北京生活垃圾混装混运仍不少

垃圾桶里，草莓等烂水果和塑料袋、纸盒等混在一起。

针对该超市未按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具了责令改正和谈话通知书。该超市将被立案调查，并面临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条例实施后，执法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为：未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监督垃圾分类工作，未按规定设置并管护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混装混运。自5月11日起，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对前期已履行告知、警告、

责令整改等执法程序，但依然存在违法行为的单位开展处罚，重点查处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混装混运违法行为。

下一步，执法部门将对违法行为和违法主体开展执法检查，重点完成对单位和社区投放环节的普查；检查垃圾清运企业，紧盯收运环节中无资质运输、混装混运、泄漏撒漏等问题；检查消纳处理环节和再生资源回收环节，紧盯消纳处理企业未分类处理生活垃圾、废品收购场所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对拒不履行分类义务、拒不落实分类措施、拒不整改、阻挠执法的单位和个人，将采取曝光、处罚、联合惩戒等手段。



## “悬崖村”开始搬新家

▲5月12日，四川省昭觉县阿土列列村第一批26户贫困户陆续下山搬新家。当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大凉山“悬崖村”——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列村第一批26户贫困户开始搬新家。

从12日至14日，阿土列列村全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344人将陆续搬迁至位于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 “天海之死”，一个当令中国足球警觉的悲剧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马邦杰)“打造百年俱乐部”“敢为天津赢天下”“三年亚冠五年世俱杯”……这些让人豪情万丈、血脉偾张的口号，还在很多天津球迷的耳边回响之际，一个他们竭力回避的残酷现实还是降临：天津海俱乐部在奋力挣扎了4个月无后，无力回天，正式宣布解散。

从其源头呼和浩特特市滨海职业俱乐部算起，天津俱乐部的历史不长，仅14年，却也曾有昔日美好的憧憬、一掷千金的投入和今日悲痛的落寞，令人唏嘘。

天海的破产让成千上万球迷为之心碎。严重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球迷的精神家园，是他们的根的维系、魂的回归之所，代表着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定。职业足球有其精神属性。这里需要豪言壮语和充满激情的口号。

口号往往指引一个目标，需要理性驾驭的实干去实现。有报道说，当年天津俱乐部名字还叫“权健”时，权健集团三年内撒出22亿元人民币，用来购买球星，支付高薪，球队一度战绩辉煌。

但任何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发展都需着眼长远，岁月历史能给俱乐部留下金钱购买不来的宝贵积淀。现任英超热刺俱乐部主帅穆里尼奥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有钱的俱乐部，你可以买来顶级球星，但是你买不来底蕴。”对此，曼城俱乐部的主教练瓜迪奥拉表示赞同：“这是正确的，你确实不能用金钱买来底蕴。”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持续成长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环境。发展职业足球需要金钱，但需预防只顾眼前，忽略长远发展的金元足球的出现。这是当年欧洲足联出台“财务公

平竞争政策”的缘由。这也是中国足协现在痛下决心要挤破足球泡沫的原因。

天海悲剧，足以让其他诸多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警觉。控制绝对股权的母公司断奶，寻找不到新的金主，唯有破产。同样的故事，其他俱乐部谁敢保证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

通过天海悲剧，我们再次看到，大多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自身生存能力存在致命缺陷。

2015年3月份，《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比权健集团收购这家俱乐部早了将近4个月。其中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

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

早在权健集团入主当时还叫天津松江的这家俱乐部之前，《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已经点明了天津俱乐部今天破产的根本原因，更点明了我们职业足球一直面临的危机。

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至今，5年时光流逝。天海俱乐部的消失，提示我们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好转。

由此可见，陈戌源去年当选中国足协主席时提出的“踏踏实实落实足改方案，老老实实遵循足球规律”这一口号，内涵何其深刻。

当然，我们希望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 「公筷公勺」上桌难在哪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路上的一家餐厅给每位食客准备了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菜，一双用来吃饭(5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良恒摄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刘良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提倡使用公筷公勺蔚然成风。近期，记者在长沙市走访时发现，部分餐饮场所仍未提供公筷公勺；有些餐饮场所尽管提供，但食客使用情况并不理想。

“五一”期间，记者与朋友前往长沙市一家老字号餐厅用餐，看到桌上摆放的台卡上印着“请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但店家给每位食客安排的餐具却只有一碗、一筷、一筷、一杯，服务员端上桌的菜碟、汤碗等餐具里也没有公筷公勺。

记者在这家餐厅发现，大多数食客是用自己的筷子夹菜，直接往嘴里送。朋友认为，有些食客可能也想用公筷公勺，但是碍于情面或怕引起同桌用餐人反感，可能不好意思要求上公筷公勺。

也有部分餐厅积极尝试让公筷公勺上桌。“疫情发生后，从恢复营业开始，我们就主动推广公筷公勺。每个餐桌上放两双颜色不同的筷子，一双专门夹菜，一双用来吃饭，每道菜的餐具里都放公勺。”长沙市岳麓区佑母塘路上一家海鲜餐厅的工作人员曾德勇对记者说。

曾德勇告诉记者，部分食客缺少用公筷公勺的意识，对公筷公勺视而不见；有的食客吃着吃着就把吃饭的筷子和夹菜的筷子弄混淆了。

长沙餐饮业者赵婷说，围桌共餐在中国历史悠久，绝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养成吃饭，想让大家短时间内理解接受并改变绝非易事。

“目前属于倡议性质，疫情发生到现在不过三四月，一些餐饮企业推广公筷公勺效果暂时不理想，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曾德勇认为。

长沙市一些餐饮业者认为，推行“餐桌革命”，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合作，积极作为。推行“公筷制”需要持之以恒，促使广大市民在思想上真正认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萍指出，剩菜“打包”理念传入内地，一开始也不被人们认可，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一理念如今已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推广“公筷公勺”不能急于求成，但也要避免疫情结束后就不了了之。

“可以考虑出台部门规章和行业公约，敦促餐饮企业积极推广公筷公勺。”李萍说，“也可以通过设立‘全国公筷日’、开展健康主题教育等举措，努力营造‘人人用公筷’的社会氛围。”